

重入家庭绵延的河: 新生代农村女性的生养实践及其生存论转向

万书润民, 李佩娴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世纪之交中国城乡社会的极速转型, 从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形塑出洋溢着现代性特征与个体化面向的新生代农村女性, 这种生存论状态却在她们进入家庭生养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系列转向的契机。生养实践带来了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筹划, 影响了主体在家庭结构中的客观位置, 也改变了主体的角色期待与关系模式。共世代的生存论结构提供了推己及人的人心训练, 为主体创造由“生生”体悟“亲亲”的具身性体验, 其中的本体性情感构成主体体悟“不忍”“操心”等社会性情感的桥梁。于是, 养儿艰难的实践意识效应与缘情制礼机制, 为新生代农村女性从自我中超拔出来提供了对象、场域和情境, 自我的生命能量延展至他者, 围绕“家”来创造美好生活, 重入家庭绵延的河。现代性大潮下, 青年准成人期延长、社会参与和主体意识不充分, 农民家庭作为一个整合了凡俗功能和超越价值的社会组织, 对于主体来说亦是一种实践性的位育, 在这个意义上, 生养实践成为新生代农村女性再社会化的关键过程。

关键词 生养实践; 位育; 母职; 代际时间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26)01-0189-12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xkb.2026.01.017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提出, 婚姻、生育和抚养都并非男女私事, 尤其是“损己利人的生育”混杂着“夫妇的配合”, 并有“世代间的隔膜”, 因此形成了一种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和道德性的生育制度^[1]。当前, 这套制度似乎正受到挑战, 根据官方数据, 我国人口从2022年开始负增长, 曾作为人口出生高地的农村地区, 生育率也变得低迷^①。互联网社区中“为什么年轻人不想生孩子”等话题也冲上热搜。似乎生育给年轻女性带来的多是矛盾、冲突和麻烦等负面影响, 以至于“智者不入爱河”“为自己而活”的面向在公共讨论中被放大。

具体来看, 城乡社会转型之下, 农村新生代女性逐渐掌握家庭生育决策权^[2], 她们对生育质量^[3]、抚育模式^[4]和抚育成本^[5]的考量显化, 尽显生育决策的理性与审慎。同时, 她们在生育后的抚养教育环节中也表现出积极母职, 在工作、社群、价值层面对自身赋值^[6], 虽不能达到城市母亲“母职经纪人”的程度^[7], 但自我增权、自我赋能的母职和艰难摸索、焦虑压力型的母亲往往是多数农村母亲的真实写照^[8]。并且, 她们在教养子女的过程逐渐成为家庭生活的担纲者^[9], 以子代为核心将三代人动员起来^[10]。从其生养之慎重尽责来看, 她们仍在为子代操心, 以家共同体为内核追求美好生活。那么, 生养的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 既能对冲城乡社会转型的压力, 又能调和“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面向?

目前, 对女性生育抚养的研究多集中于母职范式, 包含着学者将微观的生养与中观的家庭—社区结构以及宏观的社会转型相结合的研究抱负。只是, 研究多落脚在母职困境, 特别是社会支持阙

收稿日期: 2025-03-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县域视角下进城农民城乡两栖生活实践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24CSH021)与“基础教育阶段农民家庭教育投入负担、成因与治理研究”(24CSH038)。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如下家庭和工作难以平衡^[11]。因此,母职研究内涵着“母职是一种惩罚”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假设,期待着理论预设的澄清和问题意识的本土化^[12]。因为这种根源于个体主义、更多在都市社会中产生的母职问题,往往使讨论陷入个体和家庭的两难,以至于讨论过于私人化而缺乏公共性,并且中国社会的性别、家庭、阶层、城乡均有其独特性^[13]。以母职形象的城乡分殊为例,农村女性的母职困境源于她们被动处于教育责任家庭化和教育竞争当中,背后是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结构性问题^[14]。并且,城乡张力下农民家庭有实现扩大化再生产的压力,使得女性往往选择牺牲事业和工作而照顾家庭^[15]。这一张力下的抉择偏向,体现出农村女性深层价值内核的家庭主义倾向,有别于城市母亲陷入理想母职的个体叙事^[16]。不难发现,“生养”与“个体化”之间并非线性关联,而是受到环境影响和结构传导。因此,剧烈社会变迁与城镇化压力之下,农村女性对子代和家庭的持守使得本土母职研究的关切可能是:这种“牺牲自己,奉献孩子,照顾家庭”的认同与行动逻辑,如何在新生代农村女性身上延续?而农民家庭继替背后究竟有没有发生代际关系理性化的“价值之变”?

在家的哲学研究中,孙向晨指出父母与“我”在最初的“共世代存在”中的关系,“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蓼莪·诗经·小雅》),生养的系列实践构筑出具象的“生生”与“亲亲”,成为“家”的生存论内核^[17]。李银河通过生育文化的研究也指出,“一个法国女人对生孩子这件事可能会感到吃亏得很,避之唯恐不及;可中国农村的女人却个个趋之若鹜,乐此不疲”,这背后是个体如何看待他者、如何处理和安排生活世界的文化差异^[18]。为此,有必要进入农村新生代女性的主体视角,对“生养实践”进行观察和审视。当下,成长于剧烈社会转型中的“90后”及部分“00后”正是生养实践的主体一代,相较于“80后”呈现出更为显著的现代性特征^[19],可以被称为新生代,构成了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剧烈交互中形塑的特殊社会代,“自己的活法”成为深植于个体生命惯性的自然外化^[20]。于她们而言,生养实践促成个体忍受牺牲、超越自我的核心机制是什么?生养实践如何促成其身体、心灵和生存论状态的变动?而洋溢着现代性特征与个体化面向的新生代农村女性与传统农民家庭的价值伦理又怎样完成接洽?世代继替与文化继替的痛点在哪?又将走向何处?这些问题都亟待解答。

基于此,本文希望从世代转型出发,将母职研究向包含着生存论意义的生养实践拓展,考察“她们”与“中国农民家庭继替”的关系。为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深入女性主体的经验世界,关注她们在时代转型下的早期社会化经历与世代特征,同时需要考察拥有这种世代特征的她们在生养实践中的生命体验与生存论转向,进而提炼出生养实践推动个体实现社会与价值继替的机制。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 世代转型视域下的青年与“家”

西方社会急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推动了对世代的研究,世代差异与不同世代的共存相反相成,成为人类社会传承继替的重要特点。卡尔·曼海姆第一个将代问题社会学化,世代被理解为根源于社会位置的一种内在趋势,“经历同一具体历史问题的青年可以被视为处于同一现实代”,“具有共同命运的人们反应的一致性能产生特定的代单位”^[21]。因此,共世代经由相类似的社会境遇产生,社会变化越剧烈便会产生越多的世代,世代间的区别也更大,如上世纪西方社会的极速转型与层出不穷的青年文化。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一书当中指出了世代区隔与社会化环境的关系,每一代人都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经验习得方式与外化表现形式存在差异。现代社会中的文化与经验传递过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造成长辈需要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22],曾经以长辈、传统为尊的文化继替内核也发生了转变,国内研究也将文化反哺作为后喻文化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的表征^[23]。然而在文化继替的意义上,不同世代的共存不免被忽视了。

中国农村青年的消费方式^[24]、生活模式^[25]、婚恋方式^[26]、婚居模式^[27]都发生了剧烈转型,生育决策权外,新生代女性也逐渐掌握了当家权^[28]。巨大的世代差异和世代隔膜,引发学界对农村新生代青年主导下家庭伦理价值转向的困惑与隐忧。费孝通亦在《生育制度》中专作一章来谈“世代的隔膜”,彼

时也是新旧社会潮流激烈交战的时刻:父母将子女作为生命的延续,甚至视作自己的一部分,是比较自然的,而子女能否与父母共生、契合,则是依靠“推己及人”,是通过后天的培养来完成的。这培养中有种种阻力,最大的困难是子女并没有做父母的经验,不能充分了解父母的心情,“生子才知父母恩”,也从反面说明“没有子女的人是会和父母达到全盘契合关系,自己所没有的经验是无法推及于别人的”。世代作为时代变革的载体,社会标准在家内出现竞争和兴替,于是“社会变迁最紧张和最切骨的一幕,就这样开演在亲子之间”,以至于文化绵延成为问题^[29]。不同世代的共存与理解如何可能?

因此,有学者关注现代性下代际团结与家庭韧性的生存论内核。杨华认为,市场经济侵蚀下,家之外基本上都构成竞争场域,成功和受挫都不免紧张焦虑,只有家这样一个非竞争性场所才是情感的栖息之地^[30]。孙向晨也指出,现代性带来的虚无冷酷之下,汉语世界反而发生“归家”的趋势^[31],家作为中国人的“共世代”生存论结构,明显区别于个体本位、世代存在明显断裂的西方社会模式^[32]。质言之,世代差异中世代交融共存的可能,需要以共通的经验为中介,亦需要外部环境的催化。并且,家作为农民的“类宗教场所”,不像西方宗教那样成文和教义化,而是潜藏于过日子的生命实践与人际互动当中。于是,生养实践或许就是实现世代弥合的契机,因为“农民走向超越恰恰是依存于家庭人伦,抽象的伦理理念要转化为具体的宗法制度、家庭组织、生儿育女、祖先祭祀等社会对象”^[33]。

2. 青年的社会化阶段与结构

在传统社会,婚姻生养都是公共事件。婚姻标志着青年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情单元进入村庄社会生活而“立门户”,生育则是人生圆满的重要途径。因此成家即成人,标志着个人社会化的完成,即吴飞所言,“一个合格的、成熟的人,就是能够有自己的独立家庭,能够正常过日子的人”“过日子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家庭生活是个体生命的展开”^[34]。然而,宋丽娜观察到,婚姻缔结目前已不再标志农村青年的成人,结了婚但身心仍未成年的现象很普遍^[35]。风笑天认为青年走向成人之旅的路径被明显拉长^[36],高育春指出青年的社会化越来越具有终身性、生成性与建构性^[37],社会心理学和青年学则提出准成人期^[38]、成人初显期^[39]这类新的人生阶段。这些研究侧面印证了前文假设,对于新生代农村女性而言,生养实践或许才是成人之始,是代际差异消弭、文化与价值继替的契机。因为只有主体亲身才能实现“推己及人”,才能理解家庭的日常与绵延。

在这一意义上,学界目前尚缺乏对生养实践的研究。在本文中,生养实践指的是年轻女性围绕着生育、抚养、教育而进行的系列性筹划,区别于专门化和阶段化的母职,是一种与主体生命存在状态高度相关的身心实践。从被生养到生养,青年女性与“家”的关系或许就在此处发生根本性变化,是从纵向时间轴线出发的考察。

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村社会从三个层面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是国家与农民关系从提取资源到输入资源;二是市场经济渗透,村庄社会边界逐渐从封闭到开放;三是农民价值体系和意义系统巨变,乡族组织与传统价值受到现代性的全方位冲击^[40],重构了新生代农村女性的早期社会化环境。德国心理学家罗尔夫指出,个人—家庭—社区形成了一整体性的,包含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生态系统,主体在其中实现能量交换与系统成长,完成基础性的社会化^[41]。因此在横向结构层面,本文将新生代农村女性在时代转型下的社会化过程与生存论状态,具体操作为“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基本层次。由此,我们以生养实践为节点对比主体的生存论状态变化。

二、“离家”与“个体化”:新生代农村女性的早期社会化过程及其世代特征

中国实现压缩式现代化的时期,正是新生代农村女性早期社会化的阶段,个体化、流动性、村庄解体、价值变迁等成为关键词。本质上,是生活从家庭、村落、地方以及传统混融式的系统中溢出,越来越依赖城乡社会复杂系统的配合协调,新生代农村女性成为城乡社会重组的亲身主体。

1. 个人境遇的世代特征

(1)从地方和村落中走出:社会化路径的改变。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础教育作为公共品主要是村庄内生供给,村民筹资筹劳建校舍,民办教师上课记工分。随着国家能力增强,民办村办教育逐渐被国家公办教育覆盖,学校作为现代的社会化结构,改变了新生代农村女性的社会化路径。曾经,女童往往是农民家庭的半劳动力,而义务教育的法治化保障了她们受教育的权利,将她们从家和村庄这些传统社会化结构中拉出,进入新的社会化系统。同时,由国家财政供养的专业教师队伍与现代化的教育教学体系,为新生代女童提供基础教育的同时,也为她们提供了乡土社会地方性知识以外的新知识。并且,学校空间也与村庄社会区隔开来,打破曾经相对封闭的村庄社会生活环境,乡村女童有机会进入更为宽阔的社会空间当中,获得更多非农化的生命体验。

总体上,学校的社会化结构一方面使得女童的学习专业化,即她们更少参与家务劳动和介入家庭生活,在村庄社会中也减少了社会参与和社交互动。她们对家庭、村庄社会这类传统社会化结构中的规则价值便相应地内化不足,传统的社会化路径开始转型。另一方面,学校教育逐渐成为农民家庭城镇化的重要路径,叠加少子化背景下农民家庭的情感化转型,女童的教育受到家庭托举,她们也开始不同程度地受到优绩主义以及“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报答父母”等观念的影响。只是这一过程中,个人奋斗的意识 and 个体化的面向也相对增强了。

(2)从土地和农业中走出:家庭生计模式的改变。城市的飞速发展对村庄带来“打工经济”,产生制度化的半工半耕^[42],农业劳动方式也因工业与科技的现代化而改变,“半耕”逐渐演变为以家庭代际分工为主的“老人农业”,而诸如纺织、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开始成为农村女性“半工”的主要途径。丰富的非农就业机会为农村女性带来更高的经济收入,其家庭和社会地位相对提升,曾经农业经济主导的乡村生活发生巨大变革。其结果是新生代农村女性逐渐从土地、农业和“家”中走出,逐渐拥有对职业、社会身份、自我实现与价值理想的追求。经济回报外,无论是在工厂中熟练掌握工作技能,还是做生意过程中为了美好生活而奋斗的精彩,都使得社会劳动成为一种权利,一种女性自我实现的途径,催动她们重新思考事业、自我和家庭的关系。

随着家计模式为国家和市场力量所重塑,农民家庭对女孩的期待也逐步发生改变。学龄阶段,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女孩也能和男孩一样以“知识改变命运”。成年后,她们的生活自主性空间也随市场拓展。同时,城市和市场也为女性提供了新的社群与空间,自由恋爱、消费享受、兴趣爱好等相对现代化、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得到彰显。于是,家计模式的改变促使新生代农村女性的审美、趣味以及认知来源发生改变。在生存论意义上,是个体围绕着“自我”而进行的生活筹划。

2. 家庭生活的世代特征

(1)社会丰裕与流动性增强。“打工经济”的兴起与全国性消费市场的建立,农民家庭有了更多货币收入,其日常消费品也不再局限于地方,而是极大丰富,也改变了新生代女童的成长环境。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提到西洋和中国社会的区别,前者是“工业社会—丰裕经济—无魔求得”的模式,后者是“农业社会—匮乏经济—知足长乐”的模式^[43]。“丰裕经济”意指一种个体更加张扬、欲望更为显化、社会关系更为松散的生活面向;而与“匮乏经济”相匹配的则是乐群与自适,因为人多资源少,人际关系紧密,为实现幸福不得不反求诸己。世纪之交,延续数千年的匮乏经济终于被丰裕经济取代,形成了“丰裕社会”。这意味着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终将离开那个人际关系紧密的村庄社会结构,个体开始卷入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需要不断地以自我为中心展开对于生活的筹划,因此也改变了新生代农村女性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定义。

只是,丰裕社会也有代价,农民家庭出现城乡两栖、一家三制^[44]的模式,流动性在新生代女性早年社会化阶段中产生巨大影响。留守经历或随迁体验切割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同时,流动性还意味着缺乏稳定的同辈群体,并增加了农民家庭的脆弱性,造成多因素叠加下的离婚率攀升,以及单亲家庭、隔代抚育和留守儿童等问题下的教养危机。总体上影响着她们对于社会关系的认知,如难以建立稳定的同辈群体、学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分离等,甚至于个体在社会各个子系统的流动和穿梭中,多

元结构内的规范价值以及这些规范价值本身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个体化处境。

(2)家庭小型化与情感化转向。计划生育政策使农民家庭人口结构小型化,家庭资源分配面向改变,刚性的伦理规范弱化。关于过去多子女的家庭生活,上一代农民经常提到的是,“七八张嘴要吃饭,大人没工夫管,小孩们就到处爬,或是让稍大一点的带着小的。”可以说,抚育和教养都较为粗放,资源分配上也往往遵循上位优先,如吃饭时,“大人尤其是男人要做事,就吃得好、吃得多,都紧着男人吃饱了,跟着吃一两口”。而优生优育后,家庭资源逐渐转为下位优先,开启了代际资源几乎完全向子代倾斜的时代,为新生代农村女性造就“寒门温室”^[45]一般的成长环境,她们逐渐成为家庭注意力的核心,因此社会化过程中容易造成刚性规范内化不足以及自我面向的放大。

物质和结构的变化催动心理和文化的变化,农民家庭伦理开始进入情感化的发展阶段。情感实际上一直是儒家所倡导的伦理基础^[46],儒教也因此被称为“心教”,家庭便是孔子所特设的一个训练人心的场所^[47]。而之所以亦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传统家庭伦理是刚性化、规则化且排斥情感的,一是因为匮乏经济和长期聚居一处,使得质密人际关系中的个体必须向内反求诸己;二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家”的批判混淆了作为统治工具的宗法制和作为日常生活单元的“家”之生存论结构^[48]。

而新生代农村女性正成长于这样一个时代:一面是匮乏经济改变,人与资源的关系相对缓和;另一面则是传统刚性伦理,尤其是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身份等级制度和观念进一步衰落。于是,新的家庭生活中,传统的亲子互动模式也逐渐在情感催化下演变为“协商式亲密关系”。同时,在独生子女影响下,家庭婚居模式也开始向“双系化”发展,以情感为底色的家庭生活中,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话语权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年轻女性开始成为家庭的“枢纽”,掌握话语权和当家权,出现了沈奕斐意义上的以“我”为内核,以情感认同为伸缩纽带的“iFamily模式”^[49],个体开始成为家庭组织新的凝结核。

3. 社会结构的世代特征

(1)生活面向的城镇化与社会分层。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支撑着农民家庭代际接力式的渐进城镇化,村庄社会也开始出现分化与分层,但大多数农民家庭难以短时间内实现城镇化而留在村庄,因此强化了其中的社会竞争。家庭围绕城镇化出现策略行为,农民家庭的教育意识开始觉醒,婚姻也成为其阶层维持甚至是实现城镇化的契机。因之婚姻成本上升,甚至在某些地区产生高额彩礼,以至于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子代家庭主导下的一种代际剥削^[50]。但站在新生代农村女性的角度,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她们是需要亲身实现城镇化的一代。于是,她们直面城乡社会的张力,且这张力越来越需要她们依靠调试和奋斗来弥合,以维持家庭在城乡社会系统中的生活。这一过程中,儿童阶段的教育经历与青年阶段在大城市务工和生活的体验,都让她们具身性地感受到了剧烈的城乡社会差距,其发展性的、城镇的生活面向不免被强化。

同时,于农民家庭而言,大多数中西部县域社会是一个只有消费和公共服务而缺乏内生性产业的地方,地级市以上的大城市才有更充分的经济机会以支撑家庭城镇化。而大城市的安居成本过高,因此农民家庭易处于“半城市化”^[51]。同时,乡村社会本身也在解组式微,表现为教育、医疗等城乡公共服务的分配不均,难以承载新时期家庭的生活和发展需求。“安不下家的城市和回不去的故乡”构成现实张力,城乡转型、家庭发展与社会分层造成的社会压力,最终都闯入新生代农村女性的生活,她们不得不为美好生活而紧密筹划,也加重了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焦虑。

(2)无主体的熟人社会与价值变迁。在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曾经提供稳定社会关系、维持公共生活空间甚至是熔铸意义价值的熟人社会,由于青壮年人口的流失而变得“无主体化”^[52],叠加家庭生活的变革,农民的价值与意义世界不免出现巨变。曾经“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亡从子”的伦理序列,不仅在血脉绵延中为农村女性提供了抵抗死亡恐惧的历史感;而且村落这一相对封闭的生活共同体为她们提供了地方感,稳定的社区身份成为其社会支持和道德生活的来源^[53]。熟人社会意味着村民对于彼此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关心。但对于新生代来说,一方面是这种关心因为人口流动、空间区隔而变得不再可能,“只是过年见一面”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她们也有主动摆脱这种质密社会交

往的倾向,如修建隐私性更强的住宅,或是住在城市较为封闭的单元楼中,甚至过年也不一定回村,以至于“断亲”。

因此,剧烈的城乡社会转型在空间、关系上瓦解着完整的村庄社会单元,引发公共生活空间的去社区化和虚拟化,以及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于新生代农村女性而言,城乡社会中多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需要个体仔细甄别。家庭之外,也缺乏其他的、有力的社会组织来支持她们建构价值、安放意义,无疑加深了个体的价值和文化危机。

三、“归家”与“社会化”:生养实践为女性带来的生存论重构

生养实践前,新生代农村女性的生命历程和个体化、流动性、家庭现代化、村庄社会分化解组与价值多元化等系列社会变革紧密关联,并形成其独特的世代特征与个体化的生存论状态。而其却在生养孩子的过程中有所转变,那么,生养实践何以构成转折?

1. 个人层面:从“自我”中超拔出来

(1)身为人母:难以回避的角色身份转变。新生代农村女性在家庭的支持和保护中成长起来,在当前的婚姻市场和婚恋模式中亦处于优势方。生养实践却将“孩子”这个更为脆弱、更需要受保护的个体带入了她们的生活,也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她们“在家”的结构性位置。家庭资源的流向也随之改变,她们不再是家庭资源传输的终点,个体的经济模式转化为共同体的家计模式。进一步地,生养实践提供了新的家庭生活情境,赋予她们新的角色身份。因为生养作为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成员关系重构的重要节点,具有和葬礼、婚礼类似的地位,能调动家庭成员的高度关注,构成公共事件。而新生儿的孕育和出生也必然伴随周围人的关爱、期待和照料,女性的母亲身份实化和公共化,也相应地产生系列责任,并伴随着身体上的巨大改变,于是个体对于生育和生命的直观无法回避。因此,生养实践前后女性的生命状态、社会角色和身份发生了系统转向,且转向前后的体验与情境迥异。

因此,生养实践构成女性新生活的开端,新生命意味着难以回避的付出、担当和个体状态的改变。同时,新生活构成对过去生活习惯的系统冲击,部分人会出现调试困境,因此如果家庭支持有限、社会关系阙如,“离婚”或“重回个体化”便成为部分新生代农村女性的策略选择。那么,“家”和生养实践又有什么魔力,让一部分新生代农村女性进一步走出过去习惯的个体化生存论状态?

(2)“不忍”与“长心”:本体性情感的社会性。传统儒学认为“家”对于人心训练的要点,是个体能够从自我中超拔出来,“一啼一笑,彼此相答和;一痛一痒,彼此相体念”^[54],是家人间“亲亲”的本体情感^[55],亦是“推”出社会情感的基础。“亲亲”即是一种世代之间源初性的爱;“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亲亲”亦是“推”出仁、义这类社会情感的基础。新生代农村女性由于早期社会化过程中自我面向的放大和强化,使其对“亲亲”的理解并不充分,生养实践却以其“直观”与“亲身”构成人心训练的新契机。

首先,是新生儿的脆弱性给人带来的“不忍”。许多新手妈妈表示“满眼都是孩子,不忍它离开视线”,其注意力和精力几乎完全倾注在孩子身上。于是,新生儿迫切的、无法拒绝的需要与她们的被需要,在绵密的照料哺育实践中构成“亲亲”的具身性场境,这一与“他者”痛痒相关、休戚与共的身心情感体验,以“生生”复现了“亲亲”的情境与内涵。

其次,新生儿也带来许多令新手妈妈津津乐道的生活体验:如孩子与爸爸妈妈互动时的不同;她们逐步学习育儿知识,甚至有些妈妈开始自学中医、纺织和厨艺;她们也会注意到生养实践中母子身体上的各种变化,头上长的胎泥、哺乳后拍奶嗝、止不住的口水,以及自身在孕期、哺乳期的各种不适、炎症和疼痛……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看,它们(生养实践的具体内容)都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围绕它们,亲子与夫妻间的互动逐渐使得“自我”的边界趋于模糊,个体的身心被“他者”牵动不自觉走出“自我”。于是,新手妈妈常感叹自己“不知不觉变了一个人”,开始主动操心、关切“他者”的饥寒冷暖,察觉“他者”的急难愁盼,父母长辈也感叹她们终于“长心”。

最后,生养实践促成本体情感的社会化。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是:早产儿的父母,想要亲宝宝,但

医生不允许,妈妈看着孩子太可爱,实在忍不住,就隔着保鲜膜亲。“亲”是一个动作,亦是一原初而本能的情感。只是这情感的实现,必然在交互中连带他者,让“我”在实现自我目的的同时兼顾他者,因而开始对自我进行节制,对后果有预期,对行动做出规定,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便是“缘情制礼”背后的伦理与人文机制。

于是,新手妈妈普遍感到新生儿的“情感魔力”。生养实践前,她们也在呵护中长大,或是没做过家务、没接触过排泄物、没有杀过鸡鸭。生养实践时,出于对新生儿的关切爱护,“自我”的边界被重新定义,促使个体做出曾经没做过、不会做甚至不敢想象的事,甚至在一些情境中选择委屈和牺牲自己。这在日常生活中被表达为“不忍心”“心疼”“操心”,而这种由“心”流淌出的本体情感缠绕着社会性和人文性,于无形中打破了她们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个体化”生存论面向,新生儿作为“他者”被本体情感纳入自我,使个体获得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新理解。

2.“家”之层面:从个体到“家共同体”

(1)复杂关系中理解他者的情感训练。近年来,两头走、并家婚等新婚居模式显露出农村家庭双系化的趋势,从女性主体视角出发,生养实践更是双系家庭关系进一步聚合的契机。首先,一家人围绕着孩子互动密度增加、关系和行为在空间上聚集,代际的差异和隔膜也一并显化,比如一些偏方、食疗、地方性的仪式和知识等。其次,复杂关系挑战了个体曾经的生活习惯。策略上,年轻母亲往往会围绕孩子完成生活整合,形成“亲密有间”的代际合作与生活模式,同时尽量争取父职参与,来平衡小家庭的边界与父母的距离。于是,核心家庭的“父母子”三角扩展为人数更多、异质性更强、互动结果更不确定甚至充满张力的“双系家庭”。再者,个体因为与他者高密度接触、生活,需要调整适应彼此间的距离,对于新生代来说,是对过去并不充分的社会化的一种颠覆,为个体创造了一个反思、学习和训练人心的场域。最终通过生养实践,“不聋不哑,不做家翁”的家共同体生活迥异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生活,而个体能够体会到前者,必然是经过相对饱和的矛盾冲击与自我调适,过程中附着高密度的、理解他者的情感训练。

(2)“代际时间”的实化与绵延之维。张祥龙指出:“慈爱与孝爱以跨代的方式晕晕套融、前后叠加,构成了人类的代际时间”“在理智和感官止步处,这爱还要前行,包括逆物理时流的流逝方向而行”^[56]。哲学意义上的代际时间,需要主体经由实践和具身来体会。生养实践前,女性处于小型化的核心家庭内部,是代际时间轴线的最末端,家庭内的资源和注意力汇聚于此,因此对代际时间、恩、慈、孝等概念的体会不足。而生养延长了代际时间轴线,在新生命的参照下,不仅自身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位置被明确,而且生命河流的绵延感与家庭继替的世代感也一并显化。代际时间意味着生命力在自我和家人之间施予、流动和存储,构成“逆流”的基础,抗拒着线性的物理时间,延缓生命的衰弱与老化。生养实践过程中,母亲为照料新生儿所投入的大量时间、资源与精力,既是生命能量在代际间的流动,又构成“辛苦”的身体化和自反性,她们终于体会为人父母的不易与艰难,概念和话语层面的代际伦理和生命价值逐渐具象化和身体化,更是催动主体做出行动上的改变与回馈。

于是,生养实践以“亲亲”为底色实现情感训练,以代际时间的实化促成“养儿方知父母恩”的体悟。这种体悟最终从个体“推”及至其他家庭成员身上,正如张祥龙所言,“养儿艰难的实践意识效应”带来了孝,“这个拐点出现的契机之一,可能就是人类子女去养育自己的子女之时”^[57]。质言之,生养实践便是以“生生”促使个体重新领悟“亲亲”的再社会化过程。万物生生流行谓仁,生养实践于个体而言,是生生不息和“向生而在”,个体在成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进入一种生命连续性当中。其中蕴含着生命力的反向流动,抗拒着物理性的线性时间,走出生物性的周期时间,摆脱社会性的轨迹时间,生成一种绵延辉映、交叠因缘的人文时间。

人文时间之下,生养实践充满未来性,是将孩子“这一将来能够从超逾可能处、超逾计划处”的存在带给个体,进而发展出一种新的个体认同,因为个体总是容易通过孩子而复现自己,甚至认为孩子是“属于我,就是我”的存在^[58]。这种未来性并非全然理性化,年轻母亲为孩子操心,不是要某种具体

的回报,生命的成长、彼此间真挚的互动本就是回报。于是,生养的未来性也拓展了生命的可能性,使得一种寓于绵延中的“馈赠”,给在代际中逡巡的时间蒙上一层本体情感的底色,鼓励个体走出自我而与他者深度联结,生长出“家”的绵延之维。

3. 社会层面:复杂社会中的家庭堡垒

(1)积极母职:工具理性之外的美好生活追求。因为新生代农村女性的职业与社会劳动,生养实践就构成一种取舍,年轻母亲往往会选择回到家庭而放下甚至放弃事业,西方将这称为“母职惩罚”。但相当一部分新手妈妈却表示并不后悔,她们既怀念曾经为事业打拼的自我实现,又非常珍惜陪伴孩子成长的机会。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当前“家”以孩子为中心形成强大合力,一家人虽有世代隔膜,但仍能够围绕生养实践整合一处,团体式地履行母职,年轻母亲能够得到一定的关心和支持。二是生养实践既是责任,也是一种生命体验,它不同于事业和为了个体的筹划,其时间也不同于理性时间,而是人文时间。并且,生养实践包含着一种由主体亲自参与缔造的未来性与可能性。因此,生养实践的内涵超越了工具性的母职,是将孩子纳入自我生命的过程,又连带着孩子而将自我的命运延展开,与孩子共成长,体会过日子的时光,使得一部分新生代农村母亲获致了个体化状态下无法获得的价值皈依和生命意义。

同时,生养实践中母亲以“身教”辅助“言传”,在物质和精神、规则和价值等各种意义上为孩子确立边界。这一过程中她们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如积极建构朋友圈,既有线下的交流分享和照料互助,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发的社区化育儿;同时又有来自线上的互联网社群支持,以便对良莠不齐的市场和信息进行甄别,反抗被市场化力量细分的各类标准、知识和产品。这种“孩子中心主义”的养育伦理催动着积极母职实践。于是,“教学相长”是生养实践对年轻母亲的又一积极反馈,她们在生养实践中感受到责任心、爱心和耐心等亲子情感,以及孩子长大、懂事的某个节点所带来的满足感、获得感和成就感。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父代的老去,她们也逐渐成为“家之共世代”结构的担纲者,开始向父代反馈情感和资源,将信息技术、电子产品、网购技巧等带入老一辈的生活。“家之共世代”的生活图景成为超越工具理性的存在,是不可被市场经济通约的宝贵部分,亦成为复杂、流动社会中的生活归处。

(2)为子代操心:家作为超越性价值的土壤。学界对于母职为何都落在母亲身上也展开了许多讨论。现代化转型下,家构成“制度化个体主义”中最后一个尚未解体的次级组织,“代际团结”成为个体最紧密的社会关联与社会支持形式,因此诸多市场化了的功能和责任进而家庭化,密集母职逐渐成为“家”无法回避的现实。同时,女性的家庭话语权上升并逐渐掌握当家权,在经验中表现为家庭发展型的教育决策往往都由新生代农村母亲提出。因此,“积极母职”的本质是过去“人生任务”和代际责任的延长^[59],两代人“操心”的本质未发生根本转变。过去,为子代操心被理解为“传宗接代”对于农民的类宗教功能^[60]。只是传统社会中,农民家庭一般满足于面向村庄社会的家庭简单再生产,人生任务只包括生养和婚嫁。城乡社会转型下,农民家庭发生价值变革与生活转型,代际责任延长,婚嫁不再是代际责任履行的终点,而是需要继续支持子代的生养实践。同时,教育越来越被纳入代际责任范畴。由此,生养实践下家的最小世代构成家庭生活的组织基础。

因此,新生代母亲积极、密集的母职,是由于她们率先感受社会变化,积极做出决策和应对。新生代农村母亲主动学习心理学、教育学等科学方法,为子女操心之甚可见一斑。生存论层面,操心意味着个体将原本属于自我的生命能量置于他者,以痛痒相关、休戚与共的社会情感为媒介,协助个体将自我融入他者的生命中。在这里,他者与自我的命运混融一处,生命的触角延展开来,主体将慈爱、意念以及生命能量具有超越性地向“共世代结构”中灌注,结构出既属于主体自身,又属于家之共同体的生活图景。虽然这一过程不免带有个体、主观的色彩与局限,且难以全然抵挡时代、结构的影响和冲击,但其本质是家庭内、生命间的托举与荫庇,具有深刻的超越性。于是,曾在城乡社会重组等诸现代性要素影响下的一部分新生代农村女性,以生养实践完成传统农民家庭价值内核的世代接替,重入家庭绵延的河。

四、结论与讨论

从世代转型出发,本文发现生养实践是部分新生代农村女性生存论状态发生转向的契机。早期社会化中,她们受到城乡社会转型的三重影响,总体来说形成了结构性的个体化境遇与独特的世代特征。而生养实践以身体和情感为媒介,创造了一种质密、复杂、深刻的主体关系和生活情境,为自我与他者、内与外、情感与规则、传统和现代、个体与共同体等诸多张力提供了交融的可能性场域,成为个体由“生生”重新体悟“亲亲”的再社会化契机。这种改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生养实践引发诸如家庭角色、关系、资源流动方式等的结构变动,个体具身性地进入属于自我但不局限于自我的“家的共世代”生存论结构。第二,从女孩、女儿变为母亲的过程,将孩子这一充满情感性、可能性的存在带入女性主体的世界,面对新生命的不忍和操心,心灵中流露出的本体情感向社会情感转化,构成个体走出自我的契机和“推己及人”的人心训练。第三,生养实践是以家共同体为内核进行的生活筹划,日常生活世界被“新生命”组织起来,个体的命运和生命力向着他者延展,个体的生命不再是有意义的,而是具有了总体性和未来性的向度,其丰富性和厚度也随之展开,不再一直向自我蜷缩甚至被自我囿限。

于是,在生存论哲学的意义上,孩子的存在,为个体的疲劳、辛苦和焦虑提供了一处关系堡垒和意义底座。现代性大潮下,“家”成为个体能够安放主体深层次情感与价值需求的场域,新生代农村女性在“养儿方知父母恩”的生命回环中产生对伦理、情感和代际时间的切身体会,为她们提供一个练习自我如何与他者相契合的实践场域,调和“个体存在”和“在世代中存在”两种生存论面向,“家”因此也成为一种兼顾个体与共同体的现代化形式。

世纪之交的剧烈社会转型令学者提出农村家庭的伦理危机^[61]或伦理转向^[62]之问,近年来青年的低生育、高离婚现象,亦引发学界对中国文化内核的“家”的担忧。当然,亦不乏研究指出“家”的韧性^[63]。本文从经验机制出发,不去做全肯定的判断,如家是韧性的,亦不去做全否定的判断,如家庭陷入解组危机,而是立足于新生代农村女性的主体视角,以生养实践为切口来分析世代继替,展现其过程中的主体情感和生命体验,来回答农民代际关系中的价值之变问题。

研究有两个重要的启发。第一,“家”作为一种实践性的位育而存在,因之必须保卫家庭。生养实践中本体情感向社会情感过渡的身心体悟机制,使得“家”能构成个体化的新生代农村女性的再社会化结构。而中国家庭内部所遵循的价值和伦理毕竟不是成文的,而是实践性的,因此必须经由主体亲身才能理解。并且,这套伦理和价值与市场和现代性下的个体存在论具有隔膜,需要个体深度进入与他者的关系当中,乃至生命彼此相嵌互融,这无疑与新生代女性早期社会化中的个体化状态存在龃龉。因此,“家”的共世代结构与个体化存在的内部张力,是社会组织模式之底层架构的张力。夏林清提及“家的超载拼装车”,即家除了要具备深刻的情感、价值和人格的互动基础,还需要承担生产、生活、养老、教育、医疗等功能,以及空间的城镇化和人的现代化等多元功能。于是,“家”的应接不暇,宛若一辆边跑边修补自己的破烂可怜小车,甚至在车上的人往往还嫌它跑得不够快^[64]。超载之下,父代对子代的“操心”成为家的车辆尚能拼装,且这是车辆还能继续奔向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关键。于新生代农村女性而言,有来自婆家和娘家的、分中有合、双系并重的代际支持,家庭团体式地履行母职^[65]。由此,生养实践呈现出母亲主导、祖辈配合的代际合作^[66],于互动博弈和体谅调整中,代际间的平衡与失衡相反相成,最终成就新生代青年女性由“生生”向“亲亲”的身心体悟机制。

可见,相对于价值伦理危机,“家”更早、更多地遭遇结构性危机。从社会转型的速率来看,经济结构的变化远快于观念和文化的变化,一部分新生代农村女性选择进入生养实践并一直操心,世代的隔膜消弭在家人间的痛痒相关和休戚与共中,恰说明当前农民家庭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生存论内核没有彻底消散。但是,新生代农村女性早期生命历程中的去社区化、流动性和个体化,生养实践中的生育成本、教育负担,农民家庭再生产中的婚姻成本、养老压力几相加总,便会远超“家”的载荷,家之共同体的“拼装”愈显,“家”的兜底功能、托举功能和位育功能便愈发困难,随之促动观念的激烈碰撞和文化层面的急速变革。

第二,是新生代青年女性的个体化与社会化之间的张力。马赫列尔提出,青年问题的根源是一种“边缘性”,青年缺乏与社会主体和社会结构深度交互的机会,其“边缘性、自立和参与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67]。如今的公共讨论空间中,对于“家”的指责,或对于青年与女性的不理解,是比较多的,仿佛刻意建构了一些对立。实际上,上述主体都不应成为被责备的对象,我们更应看到真正的问题是结构性、时代性与现代性施加于世代与“家”之上的巨大压力。且在复杂的现代社会系统中,青年女性或许直到生养实践才真正成为“家”的主人,拥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个体方才开始成就自我、亲身创造属于我、与我休戚一体的家共同体与幸福生活,而不是成为系统支配下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生养也应回到本体义涵,成为家庭周期与生命绵延中的自然而然,而非将其物化、对象化、目的化,并将其过程过度市场化、专业化、系统化。否则,“养儿方知父母恩”的反面就是“不养儿便难知父母恩”,“家”提供的独特的生存论状态将越来越成为一个不“体”便不能“会”的存在,而社会的存续又离不开“家”的形式。更不要说,“家”对于中国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无论是在现代化与时代转型的视野下,还是在文明继替与国际比较的视野之下,“家”都是帮助个体抵御现代性危机的特殊存在。

中国剧烈的城乡社会转型对“安其生”才能“遂其所”的家庭生活产生了扰动,然而“家”的代际团结形式,是社会解组趋势下对冲个体化与意义虚无的堡垒。因此,“必须保卫家庭”需要国家公共性力量的介入,缓和来自市场和整体社会转型的冲击,做好县—乡—村三级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均衡,减轻农民家庭的城镇化负担与教育焦虑,对社会分化、弥散性焦虑和劣性竞争进行综合性的治理。同时需要将有关性别、家庭与个体的社会讨论从私人领域引向公共讨论,多一些结构性的分析,少一些对群体和世代的道德化判断。

参 考 文 献

- [1] 费孝通.生育制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2] 李永萍.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J].中国青年研究,2023(2):59-68.
- [3] 马培津,潘振飞.皖北农村青年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学分析——以马村的个案研究为例[J].青年研究,2005(7):21-26.
- [4] 尹秋玲,夏柱智.家庭抚育模式:农村青年妇女低生育意愿的分析视角[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1):92-99.
- [5] 宋月萍.青年生育观念变化及生育友好社会文化的构建[J].人民论坛,2023(15):28-31.
- [6] 王旭清.农村进城陪读母亲的母职实践[J].青年研究,2022(6):68-79,92-93.
- [7] 杨可.母职的经纪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2018(2):79-90.
- [8] 杨笛,金一虹.教育母职化与母职的焦虑[J].社会建设,2022,9(1):25-35,85.
- [9] 周新成.枢纽与过载:陪读母亲的位置、角色与困境[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5):114-124.
- [10] 吕德文,任知言.孙代中心型家庭的形成与实践机制——以陪读家庭为中心的讨论[J].社会科学文摘,2025(5):103-105.
- [11] 洪秀敏,朱文婷.全面两孩政策下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体系的构建——基于育儿压力、母职困境与社会支持的调查分析[J].教育学报,2020,16(1):35-42.
- [12] BUDIG M J, HODGES M J. Differences in disadvantage: variations in the motherhood penalty across white women's earnings distribu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0(21): 705-728.
- [13] 吴小英.母职的悖论:从女性主义批判到中国式母职策略[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33(2):30-40.
- [14] 雷望红.中国城乡母职形象何以分化——“教育家庭化”中的城市“虎妈”与农村“猫妈”[J].探索与争鸣,2020(10):148-156,160.
- [15] 班涛,张葺.为人母难: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年轻女性的母职实践、困境与调适[J].当代青年研究,2022(4):118-128.
- [16] 陈蒙.城市中产阶级女性的理想母职叙事——一项基于上海家庭的质性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8(2):55-66.
- [17] 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18] 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 [19] 魏莉莉.青年群体的代际价值观转变:基于90后与80后的比较[J].中国青年研究,2016(10):64-75.
- [20] 阎云翔.“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中国个体化命题本土化再思考[J].探索与争鸣,2021(10):46-59,177-178.
- [21] 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M].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2] 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 [23] 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J].中国社会科学,2011(6):109-120,223.
- [24] 邢成举,魏晓丽.后扶贫时代农村青年消费的新特点——以陕西关中城郊B村为例[J].人口与社会,2022,38(1):71-80.

- [25] 吕德文. 城乡两栖者: 小镇青年的生活方式转型——基于闽西南Y镇的田野调查[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 (12): 5-13, 32.
- [26] 宋丽娜. 婚恋技术主义: 农村90后青年的婚恋实践[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9): 38-43.
- [27] 庄孔韶, 张静. “并家婚”家庭策略的“双系”实践[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3): 41-45.
- [28] 冯小. 地域文化与农村“当家权”流变——基于江汉平原桥村的文化社会学考察[J]. 人口与社会, 2014, 30(2): 37-42.
- [29]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30] 杨华. 乡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94-95.
- [31] 孙向晨. 何以归家: 现代性的救赎[J]. 学术月刊, 2024, 56(3): 20-36.
- [32] 孙向晨. 生生: 在世之中存在[J]. 哲学研究, 2018(9): 113-125, 128.
- [33] 桂华. 礼与生命价值[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02.
- [34] 吴飞.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35] 宋丽娜. 婚恋技术主义: 农村90后青年的婚恋实践[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9): 38-43.
- [36] 风笑天. 走向成年之旅: 当代青年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J]. 河北学刊, 2023, 43(4): 148-157.
- [37] 高玉春. 社会化视角下的丁克现象[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5): 87-94.
- [38] 王宁. “准成人期”: 青年研究的新范式[J]. 青年探索, 2018(1): 51-61.
- [39] 赵希. 解读“成人初显期”: 理论创见性与本土适用性[J]. 青年探索, 2020(6): 90-101.
- [40] 贺雪峰. 乡村社会关键词: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 [41] 罗尔夫. 青春期理论[M]. 周华珍, 译.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373-386.
- [42] 黄宗智. 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上)[J]. 读书, 2006(2): 30-37.
- [43]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44] 刘超.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策略与发展型家庭秩序——基于“一家三制”的讨论[J]. 宁夏社会科学, 2022(1): 161-167.
- [45] 王旭清. 寒门温室: 城镇化中农家子弟教育的家庭参与机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12): 98-105.
- [46] 蒙培元. 人是情感的存在——儒家哲学再阐释[J]. 社会科学战线, 2003(2): 1-8.
- [47] 钱穆. 灵魂与心[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48] 孙向晨. 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 新文化运动百年再反思[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57(4): 62-69.
- [49] 沈奕斐. 个体家庭iFamily: 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M]. 上海: 三联书店, 2013.
- [50] 陈锋. 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2): 49-58.
- [51] 陈文琼, 刘建平. 家庭发展秩序: 非精英农民城市化的核心机制——家庭视角下江汉平原的农民城市化[J]. 公共管理学报, 2018, 15(2): 69-81, 156.
- [52] 吴重庆.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J]. 读书, 2011(1): 19-25.
- [53] 杨华. 女孩如何在父姓村落获得人生归属? ——村落“历史感”与“当地感”的视角[J]. 妇女研究论丛, 2013(2): 19-32.
- [54]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55] 董平. “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儒家道德哲学之“伦理生态”系统的形成[J]. 哲学研究, 2006(6): 41-46, 128-129.
- [56] 张祥龙. 代际时间: 家的哲学身份——与孙向晨教授商榷[J]. 探索与争鸣, 2021(10): 60-66, 178.
- [57] 张祥龙. 家与孝: 从中西间视野来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 [58]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总体与无限: 论外在性[M]. 朱刚,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59] 贺雪峰.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从“操心”说起[J]. 古今农业, 2007(4): 1-3.
- [60] 杨华. 传宗接代: 农民生活意义的一项基本命题——以湘南宗族性村落“纯女户”为表述对象[J]. 古今农业, 2010(2): 10-20.
- [61] 贺雪峰. 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 开放时代, 2008(3): 51-58.
- [62] 狄金华, 郑丹丹. 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J]. 社会, 2016, 36(1): 186-212.
- [63] 吴小英. 寻找韧性: 代际实践中的情感转向与伦理再造——评《活在心上: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关系与孝道实践》[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4): 123-128.
- [64] 夏林清. 斗室星空: “家”的社会田野[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0(3): 88-103.
- [65] 苏运勋. 双系父权: “并家婚”中的代际关系及其实践逻辑[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1): 125-133.
- [66] 肖索未. “严母慈祖”: 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6): 148-171, 244-245.
- [67] F·马赫列尔. 青年问题和青年学[M]. 陆象淦,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

Reentering the Stream of Family Continuity: Child-Rearing and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Existential Shifts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Women

WAN Shurunmin, LI Peixian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society has shaped a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women characterized by modernity and individualization across the levels of individual, family, and society. However, their existential state undergoes a series of shifts when they engage in family-centered childbearing and parenting practices. This practice brings about child-centered life planning, influences the individual's objective position within the family structure, and reshapes role expectations and relational patterns. The existential structure of cohabiting generations provides a form of empathetic training, enabling women to experience the embodied transition from "shengsheng" (the continuity of life) to "qinqin" (familial intimacy), where ontological emotions serve as a bridge to social emotions such as "compassion" and "concern". Consequently, the arduous practice of child-rearing, along with the mechanism of shaping rituals based on emotions, provides new-generation rural women with objects, spaces, and contexts that allow them to transcend their individual selves, extend their life energy toward others, create a fulfilling life centered around "home" and re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enduring river of family continuity. In the tide of modernity, the extended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nd limite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underdeveloped self-awareness render the peasant family—as a social organization integrating mundane functions and transcendent values—a practical site of cultivation. In this sense, the practice of childbearing and parenting practices becomes a crucial process of resocialization for new-generation rural women.

Key words childbearing and parenting practice; contextual integration; motherhood; generational time

(责任编辑:余婷婷)